

中国共产党同非洲政党交往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朱 旭 张 越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同非洲国家政党交往是党对外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外交布局不可或缺的一环。由于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需求的变化,中非政党交往大致经历了奠基、活跃、变动和蓬勃发展四个阶段。总体来看,中非政党交往呈现交往对象不断增加、高层往来更加频繁、交流内容愈加丰富、对话机制渐趋成熟的特征。中非政党交往未来需要进一步夯实政治基础,加强在政治层面的交往;拓宽外交渠道,重视民主党派作用的发挥;搭建合作平台,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党交往;政党外交;党际关系;中非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朱旭,法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710049);张越,法学硕士,无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无锡,21410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往……以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夯实完善全球政党伙伴关系助力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①政党

^{*} 本文系 2018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研究”(项目编号:18CGJ012)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16 日,第 1 版。

交往具有议题宽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等优势,在推动国家和政府间交流合作中能够发挥独特作用。非洲在中国对外交往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化中国共产党同非洲国家政党的党际交往,是党对外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我国外交布局不可或缺的一环。中非政党交往^①有助于活跃中非关系,促进双方党和国家事业的蓬勃发展。回顾中非政党交往的历史进程,思考中非政党交往的未来前景,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与非洲政党交往的历史回顾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交往源远流长,其中政党间的往来对建立和发展中非友好关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非政党交往已走过 60 多年的风雨历程,日益成为中非友好关系的重要基石。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和国家利益需求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的交往经历了一个起伏的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 中非政党交往的奠基阶段 (1978 年以前)

在中国对外交往史上,非洲是不可忽略的篇章,中国与非洲的友好关系可追溯到公元前 2 世纪中国的汉代,此后两个古老文明一直频繁接触。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非关系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中非政党交往在时间上要略早于 1956 年(埃及与新中国建交)中非国家友好关系的建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首先通过一些群众组织和人民团体与非洲国家政党进行接触,为以后正式建立联系做准备。新中国刚成立,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地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纷纷发来贺电。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自 1951 年起就陆续与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等建立了联系。^②同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成立,专职开展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和联络工作。1955 年,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给中国与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

^① 本文“中非政党交往”指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的交往。

^② 李力清:《中国与黑非洲政党交往的历史与现状》,《西亚非洲》2006 年第 3 期,第 16 页。

和苏丹等非洲国家的接触提供了契机。万隆会议后至 1964 年,中国先后与埃及、叙利亚、也门等 8 个西亚北非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联系。^① 这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的友好往来打下了基础。

从交往主体和交往规模来看,一方面,20 世纪 50 年代非洲大陆兴起民族解放运动,一时间涌现出大量的民族主义政党。虽然这些政党发展迅速,但党员成分复杂,政党组织松散,执政党缺乏威信,难以有效开展对外交往活动。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中国共产党主要同非洲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交往,同民族民主政党往来较少,双方多是借助民间交往形式来沟通联系、增进了解。另一方面,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以意识形态划线,有选择地与非洲工人阶级政党来往,交往对象十分有限。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错误路线和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活动大幅减少,对外交往的范围也大大缩小,党际交往事业受到严重冲击。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的交往重在追求政治效果和国际道义,交往对象少且规模较小。

就交往方式和交往内容而言,此阶段的中非政党交往主要是非洲国家政党来华访问,为其取得民族独立和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寻求支持。在南非,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致使白人地位高于其他有色人种,全国性罢工时有发生。^② 1953 年,非国大总书记西苏鲁一行访华,向中方介绍南非国内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形势,中方热情接待了访华代表团,鼓舞了南非人民开展反种族歧视斗争的士气。20 世纪 60 年代初,非国大曾派遣几批游击战士到中国接受军事训练,为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做准备。^③ 同一时期南非共产党也派遣了党员干部来华学习民族解放斗争的经验。1970 年,刚果劳动党副主席阿尔弗雷德·拉乌尔率代表团来华访问,学习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斗争经验,中方坚决支持刚果人民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④ 此外,经济援助也是这一时期非洲国家政党所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共产党在力所能及的

① 《亚非会议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55 年 4 月 25 日,第 1 版。

② [法]凯瑟琳·科克里·维德罗维什:《非洲简史》,金海波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第 188 页。

③ 杨立华:《中国与南非建交的战略选择(上)》,《西亚非洲》2007 年第 9 期,第 13 页。

④ 《拉乌尔副主席率刚果国务委员会代表团到京 董必武副主席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贵宾》,《人民日报》1970 年 7 月 16 日,第 1 版。

范围内予以积极回应,如 20 世纪 70 年代援建的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对非洲的重大援助项目之一,在南部非洲民族民主革命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非洲对中国共产党投桃报李,支持中国维护民族独立,反对西方制裁,竭尽全力帮助中国成功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一时期中非政党的交往奠定了现代非洲走向解放、中国与非洲国家建交以及当代中非关系的政治和友谊基础,确立了中非真诚友好、平等相待、患难与共的友好传统,成为当代中非关系发展难得的宝贵财富。

(二) 中非政党交往的活跃阶段 (1978 ~ 1990 年)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停滞了十年之久的党的对外联络工作重新展开,中非政党交往进入了“官方—官方”的新阶段,摆脱了过去以意识形态为唯一准则来决定与非洲国家政党亲疏远近的做法。在随后的两年内,中联部接待了 11 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民族主义执政党代表团访华。^① 1982 年,与中国共产党断交近 20 年的南非共产党传递出友好信息,表示愿意恢复两党联系,中国共产党予以积极回应。南非共产党总书记乔·斯洛沃于 1986 年和 1989 年两次访华,增进了两党的互相了解,建立了诚挚友谊。1983 年,纳米比亚人组党主席率代表团访华,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关系,并在之后的交往中几次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其全国代表大会。1984 年,中国共产党与乌干达人民大会党、埃塞俄比亚工人党建立联系。1985 年,中国共产党与摩洛哥进步与社会主义党恢复关系。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中非政党交往十分活跃。

从交往对象和交往规模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外联络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都做了较大调整,打破了过去几乎只与非洲工人阶级政党打交道的桎梏,交往对象扩展到其他民族主义政党,交往对象逐渐多元化。1979 年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接受非洲民族主义政党的邀请,派代表团访问了索马里、坦桑尼亚等 10 国,其中 8 个国家的总统亲自接见代表团,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非洲的影响力。^② 1982 年,党的十二大确立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顺应党际关系发展的未来趋势,尊重世界各国政党争取独立自主和平地位的愿望和要求,在国际上获得了越来越多政党的赞

① 宋涛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 100 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第 64 页。

② 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 90 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第 144 页。

赏和认同,对非洲地区政党也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到1990年,中国共产党已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43个国家的49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联系。^①

就交往方式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再局限于“请进来”,也开始积极“走出去”,派出代表团、考察团、休假团等赴非洲沟通交流,双方互动性大大增强。比如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自创立以后,其领导人多次访问中国,1982年中国共产党应其邀请,派代表团访问了津巴布韦,双方进行了真诚友好的交流。还有喀麦隆民主联盟、刚果劳动党、冈比亚人民进步党等多个有过访华经历的党派都多次邀请中国共产党回访。为发展同这些政党的友好关系,中联部于20世纪80年代派出友好代表团访问了这些国家,加深了彼此的了解。除互派代表团访问以外,这一时期中非政党还通过互致贺电、签订双边友好往来计划协定书等方式进行友好交往。这段时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党先后派出中央代表团、党的干部代表团、党的专业考察团、党的中央领导干部休假团等共230多个团体访问了中国……中国共产党也先后派出56个党的代表团访问了撒哈拉以南非洲39个国家的执政党,^②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交往对象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

1978年之后,中非政党交往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受西方殖民侵略的影响,非洲国家普遍独立时间晚,基础设施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许多非洲国家政党明确表示希望得到中国的经济援助。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状况有所好转,不但主动为非洲提供人道主义救援,还积极帮助非洲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帮助博茨瓦纳种水稻、更新铁路;为坦桑尼亚提供沼气设备和专家指导;援建毛里求斯机场、塞舌尔技工学校、桑岛广播电台等。在交往过程中,诸多非洲国家政党对中国建设成就与经验表现出浓厚兴趣,因而该时期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交往的频次越来越多,交往内容也逐渐扩展到包括介绍中国社会主义探索经验、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现代化建设进程等在内的各个方面。

(三) 中非政党交往的变动阶段(1991~1996年)

由于独立时间晚以及经济基础弱,非洲许多国家长久以来都依靠外

^① 宋涛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10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第65页。

^② 蒋光化:《访问外国政党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第671页。

援勉强度日。1991 年,官方发展援助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生产总值的 9.3%,其中莫桑比克这一数据更是高达 69.2%。^①西方大国不约而同地企图通过发展援助向非洲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多党民主”的政治模式,以提高非洲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加上长期财政困难导致非洲国家内部矛盾加剧,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致使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等诸多原因,非洲多党民主浪潮汹涌而起,多数国家转而实行多党制,“到 1994 年 6 月,实行或已宣布准备实行多党制的非洲国家已猛增到 47 个,约占非洲国家总数的 90%”。^②一些信奉社会主义的执政党被迫下台,各种各样的政党纷纷出现。不少以往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紧密的执政党下台,一些新成立或新上台的政党对中国共产党尚不了解,或因意识形态而缺乏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积极性,中非党际交往受到较大影响,进入低潮时期,甚至一度跌入谷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乘虚而入。20 世纪 90 年代,台湾当局利用一些非洲国家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加紧在西非地区推行“银弹外交”策略,企图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为其争取生存空间,中非关系一度受到很大破坏。^③在“银弹外交”猛烈的攻势下,部分非洲国家败下阵来。1988~1997 年,利比里亚、莱索托、几内亚比绍等 10 个非洲国家与台湾当局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加上原有的南非、马拉维、斯威士兰等国,与台湾当局建立所谓“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一度达到 13 个。^④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与非洲国家政党交往方面的重要任务,就是减少台湾当局在非洲活动的机会,避免更多非洲国家的政党倒向台湾当局。

为重新活跃中非党际交往,巩固和加强与非洲国家政党的团结,中国共产党开始派遣高级代表团出访非洲,双边高层领导来往更加频繁。1991 年,中联部第一次组织中央政治局常委出访亚非各国,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瑞环访问了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乌干达四国,并同

① Christopher Clapham,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83.

② 高晋元:《多党民主化在非洲的发展》,《西亚非洲》1994 年第 5 期,第 7 页。

③ Ian Taylor, “Taiwan’s Foreign Policy and Africa: The Limitation of the Dollar Diplom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2, 11 (30), pp. 125–140.

④ Richard C. Lin, “Complementary Measures to Foreign Aid: Taiwan and the PRC under Diplomatic Rivalry”,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01, 19 (3), pp. 360–368.

四国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就加强双边关系和其他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会谈,交换意见,交流经验,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展现了双方对彼此关系的珍视。1993年,非国大副主席和南非共产党主席分别率团访华,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代表团进行回访,双方友谊得到巩固和加强。199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访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马里、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非洲六国,其间发表了《为中非友好创立新的历史丰碑》,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非关系的珍视,进一步推动了中非在经贸、技术 and 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的增强。由此,中国共产党扭转了对非洲国家政党工作下滑的趋势,中非关系在经过短暂震荡后攀向新的高峰。

(四) 中非政党交往的蓬勃发展阶段(1997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多党制为特征的非洲民主化浪潮逐渐平稳,摆脱贫困成为非洲国家的迫切愿望。同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现出勃勃生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稳步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这为中国共产党继续发展与非洲国家政党的关系创造了历史机遇。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坚持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①的党际交往原则,中非政党交往开始复兴并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

进入21世纪,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世界主要大国都加强了同非洲的联系,将非洲纳入其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竞争的角力场。为保证中国在非洲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积极调整对非洲的政党外交战略,以期发挥政党外交在推动发展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上的更大作用。2006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将政党交往列入中非政治交往的一部分。此后,多位党的领导人先后率团访问非洲,通过政党交往渠道,不断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落实和发展。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已与非洲51个国家110余个政党建立正式联系,^②中非关系也由“新型伙伴关系”“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全面战

①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论坛》1997年第10期,第14页。

②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中国政府网,2021年11月26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26/content_5653540.htm,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1月30日。

略合作伙伴关系”，朝着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继续前行。^①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非洲国家需求的显著变化和国际格局的演变趋势，主动调整对非政党交往的政策与方针，着重建立了务实合作的中非对话机制，不断丰富中非政党交往形式，调整政党交往内容，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对话机制方面，尊重非洲国家政党表达政见和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建立集体对话机制，提供了新世纪中非政党沟通的国际平台。在交往方式方面，形成灵活轻松的政党交往氛围，组建各式各样的研修班，如反腐败研修班、治国理政能力建设研修班和扶贫研修班等，丰富了新世纪中非政党交流的方式方法。在交往内容方面，明晰国内外发展趋势，适时改变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往来的内容侧重，顺应了新世纪中非政党交往的现实需要。

二 中国共产党与非洲政党交往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与非洲国家政党交往中存在过误解与分歧，但合作与交流始终是中非政党交往的主题。中非政党交往总体趋势向好，呈现交往对象不断增加、高层往来更加频繁、交流内容愈加丰富、对话机制渐趋成熟的特征。

(一) 交往对象不断增加

一方面，交往对象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延伸到民族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战争胜利的经历，深深激励和鼓舞着曾同样深陷困境的非洲国家政党。20 世纪 50 年代，非洲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多次表达了想要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际交往的愿望，但被中国共产党以只同马克思主义政党交往为理由婉拒，引起一些政党的不满。^②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分歧扩大，引发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一批非洲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站到苏联一边，与中国共产党中断来往。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① 李新烽：《百年中国共产党与非洲革命和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32～44 页。

② 李健：《天堑通途：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纪实（下）》，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第 685 页。

前,全世界近90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中,仅有10余个尚未与中国共产党中断联系。^①1977年底,中共中央批准了相关请示,同意民族主义政党与中国共产党交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加快了与非洲国家政党交往的脚步,与贝宁社会民主党、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等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建立联系。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新型党际交往原则以后,以意识形态为准则进行政党交往的政策被摒弃。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对象扩大到了愿意同中国共产党交往的任何合法政党,中非政党外交迎来新局面。

另一方面,交往对象从执政党扩展到参政党、在野党和反对党。20世纪后半叶,非洲国家经过长期奋斗终于逐渐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建立怎样的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旋即成为紧要任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非洲国家政党多以民族为基础,经过一段时间曲折的探索,在民族主义的自然发展和苏联、东欧的人为干预下,非洲大多数国家走向一党独大型政治,一党力量强大,长期执掌国家政权。^②因此,在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的交往以非洲执政党为主。20世纪90年代,非洲突然刮起多党民主旋风,国家内部政党斗争惨烈,一批原先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执政党失去政权,中非政党交往暂时陷入低谷。经过近30年的演变,非洲政党政治基本定型,以政党力量对比来看,形成了一党独大型、两党势均力敌型和一盘散沙型三种类型。^③邓小平提出,“国家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④中国共产党根据非洲政党政治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工作方针,与不同类型政党建立了多式多样的党际关系,不仅与一党独大型政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且与两党势均力敌型政党也建立了友好的党际关系。在一盘散沙型政党国家中,中国共产党与影响力较大的一些政党也保持着接触和交流。这些政党中,既有执政党,也有参政党、在野党和反对党。

① 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编《光辉的历程 宝贵的经验——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的建设主要成就与经验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第509页。

② 陆庭恩:《非洲问题论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第273~283页。

③ 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 No. 14 (2011~2012): 新世纪中非合作关系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78~79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692页。

(二) 高层往来更加频繁

20 世纪中叶,非洲国家政党政治刚刚兴起,尚不成熟,中国共产党同非洲国家政党的交往主要借助民间形式开展。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非洲国家政党已从疾风骤雨式的增长期,过渡到相对平和的发展期,政党数量增速明显放缓,但在总数上仍然十分庞大。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努力后,中国共产党将政党交往的重点由数量扩张转向深化政党关系上,政党间高层领导人互访就是深化政党关系的有效途径之一。进入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频繁率党的高级代表团访问非洲国家,与非洲国家政党交流合作,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曾与非洲国家驻华大使亲切交谈,深化了中非之间的友谊。^①

除派遣中央政治局委员出访非洲外,中国共产党每年还邀请多批非洲国家政党高级代表团来华访问。2008 年,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刚果民主共和国争取重建与民主人民党总书记埃瓦里斯特·博夏卜、毛里求斯社会主义战斗运动主席乔治·莱荣加尔率党的代表团访华。同年,非国大主席祖马访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见了代表团,双方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交换意见。2012 年,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总书记费利佩·帕温德率该党代表团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与之友好会谈。^②2019 年,应中联部邀请,埃及自由埃及人党政治局委员、党主席助理比拉勒率该党干部考察团访华。查阅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纪实发现,2000 年至 2021 年的 20 余年,几乎每月都有非洲国家政党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密切接触,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的党际关系。

作为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对世界造成了严重冲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防控新冠疫情取得显著成果。坦桑尼亚革命党总书记巴希鲁、肯尼亚朱比利党总书记图朱等多位非洲国家政党领导人纷纷致电致函中联部,赞赏中国共产党为抗击新冠疫情做出的努力,并对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国际合作抗疫的做法表示认可。^③习近平总书记也第一时间对非洲国家政党进行慰问。在中国积极抗疫的过程中,美国部分政客刻意歪曲事实,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粗暴干

① David H. Shinn and Joshua Eisenman, *China And Africa—A Century of Engagemen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p. 72.

② 贾旭阳:《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简讯》,《当代世界》2012 年第 6 期,第 67 页。

③ 《在抗疫合作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民日报》2020 年 3 月 30 日,第 3 版。

涉中国内政。南非共产党第一副书记马派拉、纳米比亚人组党总书记沙宁瓦等非洲国家政党要第一时间致电中联部，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① 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的高层往来没有被疫情阻断，而是以相对安全的形式继续开展，中非政党交往热度的保持，为将中非友好关系推向更高水平夯实了基础。

（三）交流内容愈加丰富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交往的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支持非洲国家政党领导人民开展民族独立和反种族隔离运动；二是无偿援助非洲国家经济建设。在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援非洲国家政党开展武装斗争，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帮助其培训军事学员，向外派遣专家和工作人员。赞比亚多党民主运动总书记萨塔曾表示，中国为赞比亚解放运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赞比亚将无力捍卫自己的国家。^② 在经济方面，中国向 36 个非洲国家提供了超 24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近 60%，^③ 有力地助推了非洲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的战略目标聚焦于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交流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政治斗争和经济援助。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非洲开始从偏重单向度的无偿援助到强调合作共赢。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经贸合作规模逐步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此外，中国在与非洲进行经贸合作时还会尽量考虑非洲国家的利益，使其从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受益。^④ 为方便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促进中非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从 2005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对 25 个最不发达非洲国家的 190 个税目的输华商品实施免关税政策。^⑤ 2021 年，中非共同制订了《中非合作 2035 年愿景》，加强双方在减贫惠农、

① 《多国政党政要反对攻击抹黑中国的行径》，《人民日报》2020 年 9 月 1 日，第 3 版。

② 罗毅：《在发展的主题下合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访赞比亚、津巴布韦》，《当代世界》1997 年第 10 期，第 9～11 页。

③ 李安山：《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转变》，《西亚非洲》2006 年第 8 期，第 14 页。

④ Edward Friedman, "How Economic Superpower China Could Transform Afric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09, 14 (1), pp. 1-20.

⑤ 《中国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部分输华商品免关税待遇》，《人民日报》2005 年 1 月 18 日，第 4 版。

促进贸易发展、投资驱动等方面的工程建设,以实际行动促进了中非共同利益的实现。

另一方面,中非党建交流日益成为中非政党交往的重要一环。中国共产党承受了历史和实践的考验,经历了百年风霜而始终屹立不倒,在党的建设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多数非洲国家政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吸引力。^①2019 年,中联部和江西省委共同举办专题宣介会,向外国政党政要介绍新中国 70 年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地方党委促进发展、减贫脱贫、改善民生的生动实践。其中,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榜样引领作用正受到越来越多非洲国家的认可。^②内容丰富的专题会议在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促进非洲国家政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加深中非政党互信合作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非卫生合作是中非政党交流的又一重要内容。自 1963 年中国向非洲派遣医疗队以来,中非卫生合作已有 60 年的历史。中国在非洲国家开展了广泛的卫生发展援助,使得非洲国家的医疗卫生水平得到切实提高。^③为应对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疫情,中国共产党积极同非洲国家政党举办视频连线等活动,就疫情防控、抗疫合作进行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同南非执政党、塞拉利昂人民党等非洲国家政党举行视频研讨会,就共同抗击疫情、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等问题交流经验。除此之外,中国向非洲提供了数亿剂疫苗,惠及非洲大多数国家,并与非洲相关国家合作生产疫苗以增强非洲本土生产疫苗的能力,以实际行动践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承诺。

(四) 对话机制渐趋成熟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的交往,以代表团互访为主,缺乏成熟系统的对话机制。进入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在与非洲国家政党进行双边交往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的多边外交活动,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机制,使得中非政党交往形式逐渐稳定下来,交往内容也保持着连

① Fanie Herman, “China’s Party Training Programs in South Africa: A Quest for Political Alignment”,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0, 13 (3), pp. 437–451.

② Obert Hodzi, “Delegitimization and ‘Re-Socialization’: China and the Diffusion of Alternative Norms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8, 55 (4), p. 310.

③ 邱泽奇等:《从对非洲卫生援助中解读中国符号》,《非洲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49 ~ 69 页。

续性。2000年,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集体对话机制——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在中国共产党和非洲国家政党的共同努力下,“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中非部长级卫生合作发展研讨会”“中非文化部长论坛”“中非智库论坛”等分论坛也相继成立,中非政党对话机制逐渐成熟。

2008年,中联部与浙江省政府共同举办了“中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论坛通过党际交往搭建中非经贸务实合作平台,以达到巩固中非合作、促进中非经贸发展的目标。^①2010年,中联部与农业部共同举办“中非农业合作论坛”,以响应非洲国家执政党想与中国加强农业领域合作的要求。^②2011年,首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召开,为加强中非青年交流,增进双方友谊,吸引更多青年人投身中非友好事业搭建了重要平台。经过多年的努力,《2022年非洲青年调查》显示,近80%受访的非洲青年认为中国对非洲具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其影响是积极正面的。^③

除实践方面的合作机制越来越成熟以外,中国共产党还十分重视建立中非政党间有关价值理念的对话交流机制。2015年,首届中非政党理论研讨会召开,为中非政党合作提供了一个交流对话的多边平台。2016年,第二届中非政党理论研讨会围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主题展开,吸引了来自非洲15国执政党的60余名代表参加。第三届、第四届中非政党理论研讨会分别于2017年、2021年举行,重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十九大的重要精神和历史性成就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

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间机制化、系统化的交流,在中非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诸多非洲国家政党以抗击疫情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面对面”交流活动。如中联部与埃塞俄比亚繁荣党就共同“战疫”开展视频交流,与南非执政党非洲大围绕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举行网络研讨会,与加蓬民主党通过“云交往”讨论执政党如何在疫情下发挥领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同倡议举行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向世界传递中非团结抗疫和

① 《中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党际交往助推中非务实合作》,《当代世界》2009年第1期,第25~27页。

② 沈家兴、刘金秀:《中非农业合作论坛(2010年8月11—12日)》,《当代世界》2010年第9期,第2页。

③ The Ichikowitz Family Foundation, “The European Business Council for Africa”, African Youth Survey 2022, April 2, 2023, <https://ichikowitzfoundation.com/storage/ays/ays2022.pdf>.

践行多边主义的坚定信念。^①

三 对中国共产党与非洲政党交往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交往近 70 年来,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深层次”的政党交往格局。^②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的关系已全面展开,如今面临进一步向战略纵深拓展的问题。展望未来,中非政党交往在夯实政治基础、拓宽外交渠道和搭建合作平台方面仍有大有可为的空间。

(一) 夯实政治基础,加强与非洲政党在政治层面的交往

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交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前,随着经贸合作在中非关系中越来越扮演着“压舱石”和“推进器”的角色,中非政党交往逐渐形成了“政党外交搭台、经贸合作唱戏”的局面。在广泛而密切的中非交流合作中,政党外交的桥梁作用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除重视政党外交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作用外,政党外交在政治层面上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应始终保持政治交往在中国共产党同非洲国家政党的交往中占有重要位置,促进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逐步成熟,加固中非团结互信的党际关系。政党交往是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第二管道”,^③有利于增进国家间政治互信,通过政党高层战略对话,可以为双边重大战略性合作扫除政治障碍。为此,中联部和各地政府可共同建设中非政治交流论坛,这样既能促进政党间政治层面的交流,又有利于非洲国家政党与各承办城市交流,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增强双边政治互信。

① 贺文萍:《在抗疫合作中建设更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当代世界》2020 年第 7 期,第 34 页。

② 《第三届中非政党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开幕 奏响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序曲”》,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7 年 11 月 29 日,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129/c164113-29675386.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21 年 6 月 5 日。

③ 《习近平在纪念党的对外工作 90 年暨中联部建部 60 年大会上强调——党的对外工作要继续往开来再创辉煌》,《光明日报》2011 年 1 月 18 日,第 3 版。

（二）拓宽外交渠道，重视民主党派与非洲政党的交往

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新形势下，政党交往为国家友好关系续写新篇章、注入新动力的责任和使命更加凸显，在此背景下，拓宽外交渠道，重视民主党派与非洲政党的交往就成为必要选择。但是，非洲部族政治的历史传统与多党民主的现实状况限制了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的交往。一方面，非洲部分国家执政党变更频繁，政党政治不够成熟；另一方面，非洲执政党与在野党大多关系紧张，中国共产党与一些在野党接触时，需要考虑执政党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在野党发展关系。在与非洲各类政党交流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寻求扩大接触面的渠道和方式，但有些局限仍然难以突破，适当发展民主党派与非洲国家政党的交往将有利于该问题的解决。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是政党外交有待进一步挖掘的宝贵财富。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政党外交不可避免地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的挑战与制约。在此形势下，让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多地参与到对非洲的政党外交中，可以减少意识形态因素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限制。民主党派相较于执政党来说，与国家政权关联程度更低，在与非洲国家在野党交往和运作方面更加灵活和方便，能够扩大中国共产党在非洲的“朋友圈”，有利于为中国发展创造一个和平友善的国际环境。

（三）搭建合作平台，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非洲国家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具有传统深厚的友谊，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执政党交往是中非关系的重要方面，中非可以利用执政党资源，为双方合作搭台。近年来，中非先后召开了“中非农业论坛”“中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中非民间论坛”等，通过执政党的影响力，安排相应政府部门代表出席，取得圆满成功。这些实践，对于深刻理解中非政党外交的特殊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中非同为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国际秩序改革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反对恐怖主义、防治传染病等诸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中非政党的政治沟通，为中非政府在

国际场合协调行动、维护共同利益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关系,与非洲在地区和国际多边舞台上通力合作提供了理念指引。在 2018 年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非洲专题会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与会非洲国家政党的积极响应,卢旺达爱国阵线全国执委委员铁托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非洲的泛非主义思想在价值旨归上具有一定相似性,得到非洲乃至全世界的广泛认同。^①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②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鲜明的价值引领、坚定的合作原则、共赢的发展理念和务实的行动计划。^③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一些政客诋毁中国的言论一度甚嚣尘上,非洲国家政党纷纷站出来为中国共产党发声,赞扬中国共产党为本国、为他国抗击疫情所做的贡献。坦桑尼亚革命党总书记巴希鲁表示,中国共产党在坦桑尼亚出现新冠病例之时,及时分享防疫经验,对于帮助坦桑尼亚战胜疫情而言正当其时。^④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合作抗击疫情的努力,客观上加快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由愿景转变为现实。中非命运共同体将中非合作推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给中非合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为拓展和深化中非党际交往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⑤

纵观历史,改革开放前,中非政党交往以获取彼此政治支持为目的;改革开放后,中非政党交往以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为目标。无论哪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与非洲国家政党交往过程中,始终坚持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秉承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态度,谋求务实灵活、效果显著的合作模式。^⑥中国与非洲曾同为反帝反殖反霸主力

① 黄涵、何晨青:《探索适合国情发展道路 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记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非洲专题会》,《当代世界》2018 年第 8 期,第 35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 449 页。

③ 李雪冬、王严:《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意义、内涵与实现路径》,《非洲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155~163 页。

④ 《在抗疫合作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民日报》2020 年 3 月 30 日,第 3 版。

⑤ 岳阳花:《对非洲政党外交大有可为——中联部副部长李进军率中国共产党友好代表团访问非洲三国》,《当代世界》2007 年第 10 期,第 12~13 页。

⑥ 周玉渊:《非洲世纪的到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 208 页。

军，同为第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当下的中国与非洲同样面临实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时代任务，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与非洲国家以政党为载体，缔造了“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①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了政党贡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

【责任编辑】李鹏涛

^① 习近平：《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1年11月30日，第2版。

The Historical Review and Thinking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PC and African Political Parties

Zhu Xu, Zhang Yue / 167

Abstract: The inter-party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African countri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iplomatic work of the CPC and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China's diplomatic layout. Due to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needs of national interest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PC and African political parties have roughly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of underpinning, enlivening, changing and flourishing. On the whole, inter-party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have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nteractions, more frequent high-level interactions, richer content of interactions, and increasingly mature dialogue mechanisms. In the future, politic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PC and African political parties need to further consolidate their political foundation and strengthen interactions at the political level; expand diplomatic channels and emphasize the role of democratic parties; build a cooperation platform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words: The CPC; Political Party Interactions; Political Party Diplomacy; Inter-party Relations;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e Dilemma and Way-out of Chinese Investors Seeking the ISDS Mechanism in Nigeria

—An Overview of *Zhongshan Fucheng v. Nigeria*

Peng Xianqi / 184

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has gradually transitioned from a capital-importing to a capital-importing and capital-exporting country. China's investments in Africa have grown dramatically in comparison to other investor countries. The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have also increased. The first investment arbitration case brought by a